

# 论清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孙旭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摘要:对地域性表现的程度是决定话本小说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清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呈如下态势:继承派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开拓,但比较表面化;摒弃派对常被前代深入表现和利用的地域性认识不足,甚至弃置不用;挽颓派力图挽救地域性表现的颓势,但作品内容却趋向说教。总的来说,清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呈衰退之势。地域性作为话本小说的内核之一,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后,话本小说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话本小说;清代;地域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4-0491-06

所谓地域意识,指话本小说家对待、表现地域性的态度。地域性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1)构成一个地域明确存在的诸种物质形态——河流、山脉等自然景物以及宅第室家、街衢巷陌等人文景物;2)维持一个地域正常运转的诸种制度形态——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3)标示一个地域最本质所在的诸种观念形态——地域民人的情感表达、性格心理等。其中第三个层面最为重要,是地域小说表现的核心。

文学作品当然要表现古今中外民人所共有的认识与情感,这也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共同指向,但这些认识与情感又无一例外地植根于特定地域与特定时代。因此,从根本上说,地域性是文学作品所必然包含的因素,只不过有或隐或显的区别;成就越高的作品,对地域性的表现往往越深入。话本小说在产生之初,即与地域性密不可分,如北宋时期的作品多表现汴梁的风土人情,南宋时期的作品大量反映杭州的景物习俗。从已确知的材料看,除清末的个别作品外,明清话本小说都产生于江南地区(此处江南地区主要指江苏中南部、浙江中北部),它们的刊刻在清中叶以前也基本集中在江南地区。这是话本小说与白话长篇小说不同的一点,使其在总体上具有比较集中且鲜明的地域特征。对地域性表现的程度是决定话本小说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评价其艺术特色、观察其盛衰变化的一个窗口。

宋元话本小说家已经从“地域对人的造就”这一角度出发,创作地域小说。不过,其在表现“地域对

人的情感的影响”时,限于思想及艺术功力的薄弱,没能将二者很好地对应起来。明代话本小说家对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进行了扬弃,在充分表现“地域对人的情感的影响”的同时,还融情入景,以景写情,创造出与地域性内容相呼应的优美的意境。冯梦龙袭宋、元、明代话本小说家的思路,也从“地域对人的造就”出发创作地域小说,不过其切入点已不再是“地域对人的情感的影响”,而是“地域对人的性格的塑造”。继之而起的凌濛初将地域性抽绎为“乡土观念”,通过表现人的不同乡土观念,来揭示人对地域的诸种不同感受,从而曲折、隐晦地反映了“人对地域的反作用”这一主题。明末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呈分流态势:作为发展派的天然痴叟、陆人龙等对冯梦龙的地域意识加以发展,表现了“不同的地域对人的塑造不同”;作为革新派的周清原从“地域与人的天人合一”角度来创作地域小说,并创造出一种情、景相契的纯美意境;作为削减派的陆云龙、东鲁古狂生等则无视,甚至滥用地域性。

按照对待前代话本小说家地域意识的不同态度,清代话本小说家大致可划分为三类<sup>①</sup>:一是继承前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的,称继承派,如《人中画》作者、圣水艾衲居士、酌元亭主人以及古吴墨浪子等;二是摒弃前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的,称摒弃派,如李渔、笔炼阁主人、鹮林斗山学者等;三是力图挽救地域性表现颓势的,称挽颓派,如石成金、刘省三等。下面分而述之。

收稿日期:2005-03-18

作者简介:孙旭(1972—),女,吉林辽源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法律文化。

## —

如果细加区分,继承派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来继承前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的。一是承袭冯梦龙的衣钵,表现“地域对人的性格的塑造”。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了一系列堪为地域标签的人物形象,以《醒世恒言》卷十八中的施润泽为例。施润泽出生于苏州府盛泽镇这一丝织之乡。丝织业号称“天孙机杼,传巧人间”<sup>[1](229)</sup>,其生产之精致、细腻可以想见。此外,因工序烦琐、禁忌甚多,丝织业还十分注重扎实、辛勤的劳动付出。受其熏陶,施润泽养成了谨细、笃实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贯穿于其养蚕、织绸、出卖、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生动昭示了特定地域人的性格特点。对于冯梦龙的这种地域意识,《人中画》作者承袭最多。以卷一为例。“燕赵多佳人”,其地的山川秀气不仅赋予相府佳丽华莲峰以锦心绣口,而且将山村少女尹苻烟亦锻就得如诗如画。红菟村“山清水秀,十分有趣”。得明山秀水的滋养、哺育,尹苻烟不仅姿容绝世,而且极为聪慧、端雅,“那里像个田家女儿,每日只是烧香、看书、作诗、写字,就像个不出门的秀才一般。”再以卷四为例。“吴中人文甲于海内”,不仅苏州才子唐辰“居止幽雅,事事风流”,品行不端的富家公子元晏亦然。元晏因“菊花大盛”而“往虎丘看菊”、游玩。他见庄临之女光彩动人,为其所动,“走了过去,又走了回来,只管仰着头看楼上”,甚至请求媒婆从中沟通。作者分别从贵与贱、良与莠两个角度,来同时表现“地域对人的性格的塑造”,从而揭示出地域对其子民的雨露普施。较之冯梦龙的单一视角,其表现更为全面,更能说明问题。

二是应和明末天然痴叟、陆人龙等人的思路,揭示“不同的地域对人的塑造不同”。天然痴叟在《石点头》卷六中,通过长寿女之夫与长寿女的矛盾——“我是打渔人,原该寻个渔户……他是编芦席的人,怎受得我们水面上风波”,揭示了水、陆对人塑造的不同。陆人龙则在《型世言》第十四回中通过流落北地的馨兰的种种不适,反映了南、北方对人塑造的差异——“南边食物精致,北边食物粗砺,整治又不对路。要去求这些丫鬟教道,这边说去,那边不晓;那边说来,这边不明,整治的再不得中意”。圣水艾衲居士、酌元亭主人应和天然痴叟与陆人龙的创作思路,分别表现了山西、苏州及中华、安南等地域对人

塑造的不同。以《豆棚闲话》第十则为例。山西人马才在游玩苏州的过程中遭到一系列的隔阂与蒙蔽——“虎丘乃虎穴矣”<sup>②</sup>。马才为虎丘景色所动,欲更求丝竹盈耳之乐,遂问向其化缘的和尚其地是否有“唱曲匠”。和尚“语言不懂”,误以为要“鲳鱼匠”,连说没有。直到马才明确说要“弹弦字拨琵琶唱曲子的”,和尚方恍然大悟,将强舍、徐佛保等老白赏推荐给。马才不知苏州专有靠帮闲、吹捧过活的习俗,误以为强舍等皆身负技艺:“贵处多才之地,怎的把手一招,就有几位来了!”感激之余,他与和尚殷殷作别。至此,山西与苏州的地域差异再一次暴露出来:白赏们定要拉和尚同去,马才以还要找个妓女,“只怕长老有些不便”相推拒。白赏们只得挑明:“敝处这些人,到是长老无甚忌讳,原走惯的。”马才为之大跌眼镜。山西与苏州的地域差异终于导致一场冲突的爆发:强舍与妓女用“洞庭市语”打情骂俏,马才不知就里,“两眼瞪天,不知甚么来历”;兼之管家别有用心,从中挑唆,马才误为“这几个蛮子”在骂自己,遂“性气勃发”,将强舍等痛打。一场兴致勃勃的娱情之游终因地域差异而以闹剧告终。再以《照世杯》卷三为例。广西边商杜景山因开罪于胡安抚,被其挟私派往安南收买禁物猩猩绒,由此中国与异域的地域差异被逐一展现出来——“可补风俗考之未逮”<sup>③</sup>。杜景山初到安南即强烈地感受到其地风土与中华体统的巨大差异,“看那国中行走的,都是椎髻剪发”;那里的菴罗果看似奇怪,“吃了满口冰凉,几口口中还是香的”……及至相交,差异更甚。店主见了客人,“手也不拱,笑嘻嘻的说得不明不白”。杜景山主动与之施礼,“那老儿居然立着不动”。后在同乡的解释下,杜景山方知晓原来“他们这国里是不拘礼数的”。安南人待人看似放达洒脱、不拘小节,其实还是有一定之规的。杜景山因为不知其地习俗,以“店官”称呼店主,被其着实发作一场:“这位客长官好不中相与,口角这样轻薄!”杜景山此后“入乡随俗”,终于诸事顺遂。如果说天然痴叟、陆云龙侧重表现不同的地域对人的生活方式塑造的不同,那么圣水艾衲居士、酌元亭主人则进一步放宽眼界,反映不同的地域对语言、风物、习俗等塑造的差异。可以说,这保证了圣水艾衲居士等人对地域间差异的表现更为细致。

三是追随周清原的足迹,反映“地域与人的天人

合一”。周清原在《西湖二集》卷二十三中，塑造了杨维桢这一可与西湖“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文人形象。杨维桢素爱西湖山水之美，居于铁崖岭，“无春无冬、无日无夜不穷西湖之趣，竟似西湖水仙一般”。在尽享西湖美景的同时，他还不忘以诗作为其写生，以使之“眉目亦妩”<sup>[2](12)</sup>，流芳于世。在此，地域与人相生和谐，相得益彰。在深入开掘地域性内容的同时，周清原还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创造出一种情、景相契的纯美意境。如卷十四中邢君瑞与西湖水仙缠绵、美好爱情的发生、发展，都有优美景物的烘托。后两人欢会，“小舟游荡于清风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没无时”。明代话本小说家已开始对意境美的探索，至周清原，则达到了较为浓郁、纯粹的程度，这增强了地域性的艺术表现力。古吴墨浪子对周清原的地域意识做了发挥。如果说在《西湖二集》中，可与西湖“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还比较少，那么这一形象在《西湖佳话》中就相当普遍了，而且其与西湖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卷六中的苏小小可以说是西湖孕育出的尤物，“日受西湖山水之滋培，早生得性慧心灵，姿容如画”；因喜西湖山水，造油壁香车代步游览。她还超越既有的社会框架，视青楼为净土，追求由其美貌、才华、率情构成的纯美。因苏小小竖起了一种与压抑、刻板的世俗追求相对立的人格标杆，“芳名至今与西湖并传不朽”。卷五中的林和靖以适志为追求原则，作诗题字、梅妻鹤子、浪迹湖山，“只觉天地清明之气，只供和靖一人之受用”。他虽以隐逸为志，却并不有意避世，珍惜自己的性情，也尊重别人的性情，完全以适性处世，宽容中显出对性情透彻的洞察。因其“隐”之纯粹，“后人思慕高风，遂以其故庐立为祠宇”。在西子湖畔，苏小小、林和靖等或追求高雅、风流的生活情趣，或关注自身的人格自由与精神愉悦，或表达对生命存在的哲理化认识，超凡脱俗，遗世独立，西湖也因此而“色泽日妍”。古吴墨浪子努力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心理与西湖之间的关系，以达到“西湖得人而显，人亦因西湖以传”<sup>[3](260)</sup>的目的。另外，周清原此前所创造的纯美意境亦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苏小小游赏石屋山中、烟霞岩畔之际，“白云低压，红叶满山，甚觉可爱”。心旷神怡、令人忧虑顿消的景色与其脱俗的性情融为一体。兼之独具慧眼，看出书生鲍仁乃潦倒英雄，慷慨赠金助其赶考，幽雅的景致越发成为她高雅人格的一种写照。

卷十三中李源与圆泽初识之三生石畔，“修竹千竿，穿石罅而出，层峦叠嶂，幽峭绝人”，与其孤冷的性情、一见如故的相知之情十分相宜。后圆泽投生，相约13年后中秋月夜会于葛川。其时，“月明如昼，漫山遍野照得雪亮”，他们至期不爽的信约在这样环境的映衬下愈为精诚、感人。突出意境营造、具有抒情意蕴是《西湖佳话》的一个整体特征，也是其艺术成就的重要体现。西湖小说成就于周清原之手，但其在古吴墨浪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继承前代话本小说家地域意识的同时，继承派还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发展，使地域小说的内涵被更为深刻地发掘出来，较有意义。但缺陷也相当明显，即时代性不强、对普通民众关注较少。那么，继承派在创作上何以出现这种瑕瑜相伴的情况呢？这与其创作目的、创作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映地域性难免关照历史，但对历史事件亦应以时代意识去观照，而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复述上。但继承派出于对“古”的强烈推崇，以复古为主要目的。如艾衲居士作《豆棚闲话》是以“廿一史”为蓝本，“化嘻笑怒骂为文章”<sup>[4](148)</sup>，古吴墨浪子作《西湖佳话》是“取其迹之最著，事之最佳者而纪之……俱彰彰于人耳目者”<sup>[3](260-261)</sup>。由此决定，他们很少通过亲身观察、体验生活来积累创作素材，而致力于对史志笔记、文言小说等现成资料的收集、择取。艾衲居士因“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册……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sup>④</sup>，古吴墨浪子则“考之史传志集，征诸老师宿儒……亟为之集焉”<sup>[3](260-261)</sup>。这在导致其作品与时代脱轨的同时，还造成了主人公非平民化的恶果。名人在某些方面固然能突出地体现地域性，但其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变数，极易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走向极端；而普通民众生活平稳、思虑较少，能保持相对纯正、深厚的地域性，更应受到关注。史志笔记等一向青睐名人逸事、奇闻要录，主人公多为贵胄名贤、文人才子、高僧名道等。继承派从中提取素材与灵感，难免受其制约，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忽视。

## 二

虽然继承派在地域性表现上小有成就，但由于摒弃派声势浩大、流荡不尽，几乎贯穿清代前、中期，

致使其成绩彰而不显。以李渔为例。在《无声戏》《十二楼》中,李渔共作话本小说 30 篇,其中涉及地域性的仅《十二楼》中《拂云楼》1 篇。虽则 1 篇,亦未能准确地抓住地域性的独特性所在。李渔这样描写杭州西湖:“偶值端阳佳节,阖郡的男女,都到湖上看竞龙舟……正看到热闹之处,不想飓风大作,浪声如雷,竟把五月五日的西湖水,变做八月十八日的钱塘江,潮头准有五尺多高”。西湖一向以“西子湖”著称,其秀雅洁媚可以想见,前人对此多有记载。如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说:“夷犹澹宕,啸傲终日,直闺阁间物,室中单条耳,不闻其有风波之险也”<sup>[2](11)</sup>。古吴墨浪子在《西湖佳话·序》中亦说:“清潭波而不涛,无怒奔之势”<sup>[3](260)</sup>。在对其优美雅致无一涉及的情况下,李渔就猝然描摹其狂飙不驯、差强人意的一面,显然没能抓住西湖的最具魅力与神韵之处。此举极煞风景,因为李渔并非与杭州全无关联之人。李渔虽然出生于扬州如皋,却于 40 岁后移家杭州。杭州不仅为他提供了栖息之所、赏玩之地,还哺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杭州,他卖文为生,先后创作出《连城戏》《十二楼》等话本小说集及《怜香伴》《风筝误》《玉搔头》等戏曲。正因为此,李渔晚年才以“老将诗骨葬西湖”<sup>[5](246)</sup>为心愿。相近、相悦西湖如斯,竟不能以生花妙笔为其“写生”,至为遗憾!

在其他摒弃派那里,地域性则被弃置殆尽,根本无现身的机会。《五色石》卷六中的郗公因“临安府城乃帝都之地,人物聚会”,前往其地为甥女择配。但作者笔炼阁主人并未适时地描摹杭州的风景及习俗以使作品增加浪漫、抒情氛围。甚至后来郗公完此重任,“因贪看西湖景致,还要盘桓几日”,及其甥女“以西湖游玩为名”前来面试夫婿,风景优美之西湖被明确提及,作者仍未借花献佛“表白一番”。《跨天虹》卷三第二则中的友生为躲避奇丑无比的新娘,逃婚西湖。作者鹭林斗山学者仅以其“看见西湖景致,不胜欢喜。盘桓数日,再四流连”作为千里迢迢逃婚西湖的交代,既未写其逃婚西湖的心理动因,又未涉及“欢喜”发生的具体过程。凡此种种,令人颇有戛然而止、意犹未尽之憾。

在摒弃派手中,那些为话本小说家所青睐的地域性被悬置起来,遭遇前所未有的冷遇。而这,亦与其创作目的、创作方法有关。在文学创作上,摒弃派

追求新奇艺术的兴趣远大于切实表现社会人生的热情。李渔曾明确表示自己对新奇艺术的欣羨,“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sup>[6](9)</sup>;如果不能达到新奇,甚至“可以不作”<sup>[7](509)</sup>。在《连城戏》《十二楼》中,其“脱窠臼”之处比比皆是——别出心裁的构思、跌宕变幻的情节、风趣诙谐的语言……而这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五色石》作者笔炼阁主人亦然。其作品为搜罗“一读惊人之新著”<sup>[8](214)</sup>的抚松居士评为“小说家之巨臂也……文字珠玉,笔彩烂熳”<sup>[8](215)</sup>,其艺术之“新奇”可以想见。追求新奇必然忽视对当时特定地域民人的性格心理的开掘,事实上他们也不想作深刻的文章,在《连城戏》《十二楼》《五色石》中,几乎找不到一篇内容有深度的作品即为明证之一。

### 三

面对地域性表现的颓势,石成金、刘省三等试图重整旗鼓、再创辉煌。石成金所作《雨花香》《通天乐》曾合称《新刻扬州近事雨花香》。由题目可知,作者意欲从时代性入手来创作地域小说,此一思路可谓切中肯綮。因为如果能将地域性与时代性贯通起来,表现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风貌(这正是“三言”“二拍”等优秀地域小说的思路),将更具认识价值。但实际情况是,作品中涉及的扬州景物及风俗,虽真实、可靠,但要么渺小无闻,要么潦草而过,皆不能代表其时扬州的地域性。惟《雨花香》卷一所记稍多:“楼之南面,遥望镇江、长山一带云树、烟景。楼之北面,正对着虹桥、法海、花柳、林堤……”但亦只是浅层次的描摹,距离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剖析还很远。我们知道,继承派圣水艾衲居士并未以西湖为背景创作小说,但他在《豆棚闲话》第二则中对西湖的一番评判却相当有见地:“西湖就在杭州郡城之外,山明水秀……无论外路来的客商、仕宦,到此处定要破费些花酒之资,那本地不务本业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内嫖赌荡费多多少少。一个杭州地方,见得如花似锦,家家都是空虚,究其原来,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无不破费几贯钱的”。以石成金对地域小说的慧心体悟,竟不能挖掘出扬州独特的地域性,较之圣水艾衲居士对西湖的

无心之论,何其令人失望!

刘省三对地域性的引入主要表现在以四川方言创作《跻春台》上。此前的话本小说因基本上出自江南文人之手,对江南方言、俗语、民歌等引用较多,特别是西湖小说,“若细加择录编排,那是有一篇《杭州风俗志》好写的”<sup>[9](671)</sup>。刘省三独具只眼,以四川方言入文,作品中“啥子”“大嘎嘎”等随处可见,既浅俗通畅,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刘省三在表现方式上还力图俚俗化,常于正文中插入大段人物独唱,有的唱中还夹有他人的道白。如卷一中的冬瓜女因要向知其底细的何医者解释逃离张府的原因,而何医者又要确认其身份,于是就出现了独唱与道白相夹杂的情况。但语言及表达方式毕竟是外在的东西,真正的地域小说乃是地域性内容与地域性形式的完美结合。刘省三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仅拙于表现四川地域性的独特之处,而且将很多以四川方言叙写的故事安排于江南,使其对地域性的表现更趋薄弱。

面对地域性表现的颓败局面,石成金、刘省三进行了一些尝试。虽然收效甚微,毕竟在摒弃派所造就的一潭“死水”上,激起点点微澜。那么,挽颓派在地域性表现上为什么善于始而不能善于终呢?这仍与其创作目的、创作方法有关。作为封建正统文人,石成金、刘省三内心所真正看重的,是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观念。如石成金对作品集命名原因的解释:“然而醒人之迷悟,复人之天良,与云师之讲义微同,贵乎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sup>[10](176)</sup>,再如林有仁对《跻春台》的评价:“此劝善惩恶之俗言,即《吕书五种》教人之法也”<sup>[11](566-567)</sup>,都透出他们对此的孜孜追求。由此出发,石成金、刘省三将话本小说定位为伦理道德“传声筒”;而这,却与地域性的引入发生龃龉。因为地域性存在的最终目的,乃是要表现人、人的情感表达与性格心理。两者矛盾、纠合的最终结果,是石成金、刘省三在地域性表现上持折中态度——在保留地域性骸骨的情况下,吹进许多自己的气息。

#### 四

纵观话本小说的发展史,其成就的高低与对地域性表现的程度大体成正比。明末是话本小说创作

的高峰期,也是表现地域性最为广泛和深入的时期,很多名篇,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等,都细致地表现了其时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民人的情感表达、性格心理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时代性与平民化构成了地域性最主要的两维。到了清代,话本小说的时代性和平民化明显削弱,作家不再像明末那样切实感受时代风潮,细致描摹特定地域对民人的情感表达、性格心理的影响,转而去或关注古代的奇闻轶事,或演绎抽象的道德说教,或追求结构语言的新奇有趣。而这些都是相对普泛化的东西,没有真正植根于特定时代民人的现实生活中。该时期地域性最明显的作品是《西湖佳话》,在题材与西湖的紧密程度、意境的营造方面,都超过了明末的《西湖二集》;但所写内容都是古人的轶闻趣事,没有反映出其时西湖对民人的性格心理的塑造。扬州在清前中期因盐业而非常富庶,较之明代的杭州、苏州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专写扬州故事的《雨花香》和《通天乐》却没有像《西湖二集》那样,揭示出当时扬州社会生活的独有风貌与民人的特定心理,而是进行干巴巴的说教。李渔追求作品结构的新奇与语言的有趣,从中可感受到江南才子风气的影响,尤其是活泼有趣的语言风格在明末一些作品中就已很明显,这当然也是一种地域特点;但比起在内容上切实描绘地域风貌及对民人的性格心理的影响来,就相对表面化了。总之,在表现地域性方面,清代话本小说有一些开拓,但在最重要的时代性与平民化方面却严重倒退了,小说家没能将前代积累的地域意识成果很好地继承下来。至于地域意识衰退的原因,可以从统治背景及社会风气的变迁、话本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等方面去寻找,这里不再赘述。地域性作为话本小说的内核之一,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后,话本小说的衰落也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注释:

① 本文判定清代话本小说家的标准,主要依据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江苏社科院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等。

② 鸳湖紫髯狂客回末总评。

③ 谐道人回末总评。

④《豆棚闲话·总入话》。

参考文献:

- [1] 宋应星. 天工开物·乃服第六[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9.
- [2] 湖海士. 西湖二集序[A]. 西湖二集[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 [3] 古吴墨浪子. 西湖佳话序[A]. 西湖佳话[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4] 艾衲居士. 豆棚闲话序[A]. 豆棚闲话[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5] 李渔. 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A]. 李渔全集·第一卷[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 [6] 李渔. 闲情偶寄·词曲部上·结构第一·脱窠臼[A]. 李渔全集·第十一卷[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 [7] 李渔. 笠翁一家言诗词集·附窥词管见第五则[A]. 李渔全集·第一卷[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 [8] 笔炼阁主人. 五色石叙[A]. 五色石[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9] 阿英. 〈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A]. 西湖二集[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 [10] 石成金. 雨花香自叙[A]. 雨花香[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 [11] 林有仁. 新镌跻春台序[A]. 跻春台[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On the regional consciousness of story-telling script stories writers of the Qing dynasty

SUN Xu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of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The level of local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deciding the merits of story-telling script stories. The regional consciousness of story-telling script stories writers of the Qing Dynasty appeared as follows: the inheriting group opened up some fields, which were apparent; the discarding group not only underestimated the localism, but went so far as to reject; the rescuing group strived to rescue the localism, but the contents of their works were precept. In a word, the regional consciousness of story-telling script stories writers of the Qing dynasty proved to be in the decline, that is, the story-telling script stories declined with the diminution of the localism.

Key words: story-telling script stories; Qing dynasty; regional consciousness

[编辑:苏慧]